

明代西南地区文人结社现象考述^{*}

——以巴蜀文人结社为考察中心

黄梅¹ 李玉栓²¹

(1. 重庆工商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 重庆 400067; 2.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上海 200234)

摘要: 明代蜀中文人结社兴起于正德年间, 发展于嘉靖年间, 至万历时期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逐渐多样化。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 受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 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与当地的地域文化相因相习、互为增益, 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巴蜀地区文人的文才风流, 传播巴蜀地区的文学观念。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推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 对巴蜀文学的传承以及文化传统的构建具有促进作用。

关键词: 明代; 巴蜀; 文人; 结社; 现象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342(2019) 06 — 43 — 08

文人结社是明代文学的典型特征, 明代稍具影响力的文人几乎都曾参与过文人结社^[1]。文学社团的成立和发展有利于地域文学的兴起与繁荣, 巴蜀地区的文人通过结社集会, 赋诗研文、讲习交流, 促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 对巴蜀地区文学的构建及完善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学界对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的研究尚未引起足够关注, 未曾重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对明代四川文学发展的重要性, 也未能观照到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对整个四川文学史脉络形成的重要意义。鉴于此, 本文对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结社活动进行了深入探讨, 梳理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情况, 分析了文人结社的特性, 探寻了巴蜀地区文人结社的文学特征及文化意义, 以期对明代四川文学及文化研究有所助益。

一、明代巴蜀地区文人结社情况概览

明代四川地域范畴包含了巴、蜀两地, 在经历了元末明初明玉珍大夏政权后, 明代巴蜀地区的文学十分萧条, 经由洪武、永乐年间的多次“湖广填四川”移民事件后^[2], 巴蜀地区的文人逐渐成长起来, 到成化年间巴蜀地区的文人初显声名, 至正德年间巴蜀地区的文人逐渐发展壮大, 地域性的文人结社至此开始出现。明代四川文人结社活动在正德时期开始出现, 至嘉靖万历年间逐渐增多, 正德至嘉靖年间主要以诗社、文社为主, 万历年间随着晚明思潮的影响, 文人禅社也逐渐出现。本文根据《明别集丛刊》《中国地方志集成·四川府县志辑》《全蜀艺文志》《明代文人结社考》《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以及《四库全书》所存明代蜀地文人的诗文集统计出明代巴蜀地区文人结社共十一例, 具体情况如下:

¹收稿日期: 2019 — 07 — 22

***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古代文人结社史”(项目编号: 11CZW048); 上海高校高峰学科建设计划项目“中国语言文学”(项目编号: A-9103-16-065-006)。

作者简介: 黄梅(1991 —), 女, 重庆工商大学讲师; 李玉栓(1973 —), 男,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博士。

1. 丽泽会。结社时间为正德元年(1506)，参与者有杨慎、石天柱、夏邦谟、程启充、张含等人。

丽泽会是讲习与科举的共同产物，天顺年间陆愈、成化年间卢楷都曾结丽泽会。简绍芳在《赠光禄卿前翰林修撰升庵杨慎年谱》中记有正德元年丽泽会结社情况：“正德丙寅与同乡士冯驯、石天柱、夏邦谟、刘景寅、程启充为丽泽会，即墨蓝田永昌张含，结社倡和。”^[3]丽泽会集会讲习次年，结社成员皆中乡试，正德三年(1508)石天柱、夏邦谟、程启充、刘景寅中进士，而杨慎因灯芯落卷于正德三年的考试中落第。丽泽会结社聚会后，众人在科举考试中皆有佳绩，这与此次集会讲习、互相增益亦有密切关系。

2. 峨眉集会。集会时间在正德十五年(1520)夏，参与者有徐文华、张凤、章寓之、王宣、安磐、程启充、彭汝实七人，皆为嘉定州人。

张凤、章寓之、王宣、安磐、程启充、徐文华、彭汝实七人皆是仗义执言、性情耿介之辈，七人在峨眉集会后被合称为明代“嘉州七贤”。其中安磐、程启充、徐文华、彭汝实较为年轻，且为官期间不顾己身、忠言直谏，四人又被称为“嘉定四谏”。刘君泽《峨眉伽蓝记》载：“嘉州七贤罢官回里(1)，遨游山水，尝集饮寺中，有诗碑记其事”。《峨眉续志》录有为张凤、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七人的《西坡寺联句》；峨眉山灵岩寺存有“七贤诗碑”，碑刻了徐文华的《灵岩寺》以及安磐的《绝句四首》。王士在《池北偶谈》记云：“予登凌云寺，石壁刻诗甚多，惟松溪四绝句最为高唱……至其地，知其诗为工也。”^[4]

3. 凌云会。集会时间为嘉靖二十年十月，地点在嘉定州。参与者有刘汝文、杨慎、程启充、李迁、刘大谟、敖英等人。

刘汝文，家贫博学，尤长于《尚书》，时人崇之。《四川总志》载“时有凌云会，慎共推汝文主盟，条约赏罚，众不敢犯，后人称之为耆儒”。杨慎在《清音竞秀诗卷序》记有凌云会的具体情况，其云：“蟠峰李子子安，衔使于蜀，东阜刘子作诗赠之，猗斋谢子继之，东谷敖子三之，初亭程子四之，毫予不敏五之，属而和名又若柯首，以成什。乃孟冬廿日，会于凌云之清音、竞秀两亭，临睨久之，且邀予篆题。”^[5]程启充，字初亭，嘉定州人。李子安、刘大谟、敖英三人非蜀籍文人，皆时任蜀地官员(2)；嘉靖二十年(1541)，刘大谟发起重修《四川总志》，礼聘蜀籍学士杨慎、杨名等担任编纂。凌云会是杨慎在四川交游结社其中之一，参与者多为蜀地官员及修撰《四川总志》相关的成员。

4. 章懋汐社。汐社发起时间为嘉靖三十二年以前，地点在泸州。

汐社的发起人为章懋，杨慎至泸州后加入了汐社，杨慎在《章后斋寿诗》云：“我卜江阳隐，君为汐社英。”又在《戏简》云：“虽参汐社名，未饮汐社酒。社房如蜜蜂，各自分户。”^[6]杨慎此二诗表明章懋在杨慎侨居泸州之前已经结成汐社，从杨慎的诗中也可以了解到章懋主导下的汐社宗旨不够明确、社友关系不够密切，汐社组织比较松散。

5. 紫房诗会。结社时间为嘉靖三十六年，参与者有熊过、杨慎、曾屿、张佳胤、章懋等人。紫房诗会为汐社的一次具体社事，主导人已由章懋变为杨慎，杨慎侨居泸州期间取代章懋成为汐社的主导者，与熊过、曾屿、章懋等人以文会友，主持了北岩宴饮、紫房诗会、江亭小集、南定楼刻烛裁诗等社事活动。嘉靖三十六年(1557)张佳胤因父丧守制在乡，特意前往泸州拜会杨慎，结识了曾、熊过等蜀中名流，并相与饮酒游赏，结成紫房诗会。杨慎有诸首诗记录了紫房诗会，如《紫房诗会，章后斋、熊南沙别馆所招因简》《张炉山寓紫房道院，灯下出谢四溟游燕诗帙，阅之因寄》。张佳胤也作有《升庵载酒访余紫房洞中，兼订峨眉之约》《大观台远眺，同曾少岷太守、杨升庵太史、朱芑山少参，熊南墩、董豸屏二进士》等诗记此次集会出游之事。

6. 浣花社。浣花社发起时间在万历初年，主导者为郑仕阶、乡绅韦布，参与者有杨师心、杨、李元龄、秦嵩、张正学等。

浣花社的发起人为郑仕阶和韦布，《(天启)四川成都府志·人物志》郑仕阶一条中记“郑仕阶，成都人，仕白水令，乞归终

养事亲，与士绅布结浣花社赋诗，赋诗似王维，士乐亲之”^{[7]325}。郑仕阶著有《浣花诗稿》《扇影集》为里中传诵，惜现已不存。杨师心为成都府华阳人，“初举于乡，再上春官不第，即隐居不出，日惟歌咏自娱，引掖后进，孜孜不倦。里中文士惧古文词有碍举子业，禁止不语。师心独力排之，结社引后进，往来浣花”^{[7]311}。浣花社成员记录集会交游的诗歌甚多，李元龄的《九月五日同社中诸友登北城楼》《七夕同诸友游石犀寺》，秦蒿的《重九集浣花社用杜韵》，杨的《浣花社友至》《约诸老春游》，张正学的《新正二日同社中四友宴牛山草堂》皆记录了浣花社成员出游集会之事。

7. 青莲社。结社时间在嘉靖年间，参与者有张峨南、杨慎等。

张峨南，泸州合江人，《(光绪)泸州直隶州志·人物传》中张峨南一条记其“渊博好古，不屑仕进，与杨慎等名流结青莲社，为文史之娱，里中问字者，咸执经造焉。诗筒酒盏，怡怡自得”^[9]。

8. 八愚社。结社时间在万历初年，地点为资州，参与者为周以庠、周仲士及周以庠门人弟子。

周以庠，字之学，号太愚，成都府仁寿人。隆庆元年(1567)举人，任资州知县，尤加意人才，拔邑之颖异者八人督课文艺，名曰“八愚社”，取其自号之意，其子仲士亦入社中，社中五人俱登进士。

9. 邓之屏诗文社。结社时间在万历四年以后。

邓之屏，字惟邦，号后江，为诸生时以孝行称道，嘉靖三十八年(1559)中进士，为官廉政爱民，时有“治郡如家，爱民如子，礼士如宾”之称。《(民国)巴县志》卷十有载“万历四年正月，为福建按臣所劾罢归，归结诗文社，讲经义”^[10]。

10. 莲社(净土社)。结社时间在天启初年，参与者有范文光、闻达大师等。

范文光，内江人，天启元年(1621)举人，任官楚地时，为当地显贵所恶，辞官归隐于峨嵋之花溪。其栖心禅学，与眉山闻达大师结莲社，吟咏甚富。《(同治)嘉定府志·艺文志》录其文《续莲社序》。

11. 李韵诗社。结社时间在崇祯末年，参与者有李韵、万慎、刘等人。

李韵，字非，富顺人，廪生。《(光绪)叙州府志·人物志》中李韵一条记“崇祯末与万慎、刘辈结诗社于乡塾，兵乱入寺为僧”^[11]。

本文所论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皆为在明代四川境内的结社，巴蜀文人在他地的社事如晏铎在京师结十子社，周洪谟在南京的清恬雅会，陈宗虞、任瀚及张佳胤在京为官期间结的玉台社，黄辉与袁氏兄弟所结的蒲桃社等另做论述，不纳入本文研究范畴。

二、明代巴蜀文人的结社特性

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主要活跃在成都、嘉定州、泸州等地。正德以后蜀地文人结社兴起并逐渐增加，结社的主导者与参与者多为川蜀之地颇有声名的文人士子。文人通过结社集会促进了蜀中文学交流，文人结社是明代四川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结社时间来看，正德之前，巴蜀文人皆是在他地参与社事，京师景泰十子社中的晏铎、南京清恬雅会中的周洪谟皆为参与者，即非主社者亦非在蜀地所结之社。在正德元年，蜀地出现了第一个有明确记录的社事——丽泽会。丽泽会的主持者和参与者皆为年轻士子，与同时期的甬上耆会、高年诗会、怡老会不同，蜀地出现的结社成员年轻有活力，也反映出正德年间四

川文人才士逐渐涌现。嘉靖年间四川的文人结社逐渐增多，这与正德年间的士子卸职返乡及巴蜀地区文人辈出密切相关，如凌云会的主导者杨慎、程启充皆为正德元年丽泽会中成员；杨慎主持紫房诗会时已具盛名，而此时张佳胤、熊过等文人才俊则在文坛初显声名。至万历年间，蜀地文人结社出现了纯粹的地方性结社——浣花社。浣花社主事者为地方士绅与地方文人，社中成员皆为未显声名的年轻才士，所举社事以交游赋诗、歌咏自娱为主。天启年间，文人结社则更加私人化和地方化，结社的文人数量及诗文记录都更少，如李韵诗社、邓之屏诗文社，除了地方志中留有记录外，其余资料皆不可考，当然这也与明末张献忠屠蜀烧城至文献损毁失传相关，未能留下结社具体情况的文献以供后世查阅。

从结社地点来看，文人多选取风景名胜和具有历史遗迹、文人逸事的地方结社。文人聚集之地也因名人效应更具盛名，实现了风景名胜与人文景观的结合，既满足了文人的精神追求又丰富了文人结社的内涵。成都浣花社社事选址于浣花溪边，唐代薛涛、杜甫在蜀中都曾居住于浣花溪旁，在此处留下了不少诗作和故事。凌云会集会于嘉定州凌云山凌云寺，凌云山寺留下诸多文人的足迹，黄庭坚游凌云寺作有《凌云记游诗》，苏轼为凌云山南峰之亭命名为“清音”^[12]。峨眉山更是留下了众多文人游士、禅师道士的笔墨诗作及佛法道典，陈子昂、李白、杜甫、齐己、苏轼、范成大等皆有诸首吟咏峨眉山的诗作。明代蜀中文人游览峨眉所作诗歌更多，正德十五年峨眉山集会成员游峨眉共作有五十余诗，其中安磐作有与峨眉相关诗作三十一首，王宣有诗六首，彭汝实有诗五首，程启充、徐文华各有诗四首，张凤有诗三首，章寓之有诗两首，诗中皆吟咏了峨眉的风景名胜及交游酬唱之乐。

从成员身份及活动内容来看，巴蜀文人结社可分为两类，一类为规格较高、活动记录较多的结社，如凌云会、紫房诗会。此类参与人员多具备官员、文士两身份，安磐、章寓之、王宣、张凤为弘治年间进士，杨慎、程启充、彭汝实、徐文华、曾屿为正德年间进士，熊过、张佳胤、章懋为嘉靖年间进士。此类结社不仅有交游酬唱之作，也有文人观点、文学主张的交流，如张佳胤在与杨慎结社酬唱后，对杨慎的六朝诗学观点及采摭史志之法有所接受。张佳胤在《跋杨用修诗卷》中言“其时翰林中然尊古，可以嗣建安垂拱之响者，则唯先生一人”^[13]。张佳胤也曾校刻《华阳国志》，其在叙文中记“舫舟江阳，与成都杨用修夜谈里中文献，因请所藏璩志旧本，录之笥中”^[14]。第二类则倾向于地方性小团体组织的结社，旨在赋诗为学，如浣花社、八愚社。浣花社的成员多为里中士子，其结社主旨为交游赋诗，在酬唱中增进诗文才识，社中的主事者意在“引掖后进”；八愚社选取里中八才士进行结社，结社宗旨也更为明确，其旨在“督课文艺”，皆是以结社的方式督促士子学习。

三、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文化因缘

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属于地域性文人结社活动，必然受到地域文化传统的影响。巴蜀地区的文化以儒家为主、融汇佛道思想，自西汉以来出现了诸多文学家、经学家和史学家，尤其在文学方面蜀中文人颇有造诣，相如赋、青莲诗、东坡词至今仍在文坛辞章上赫赫生辉。明代巴蜀文人受蜀中先贤、文豪的激励及影响，在文学创作、文化承袭等方面沾染了先辈的特性，而文人结社是地域性文人群体活动，其更全面地呈现出巴蜀地区的文化特性。

首先，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与蜀中的先贤、文豪相因相习。明代蜀中文人继宋代三苏之后再次活跃于文坛，因此明代蜀中文人才士也常被比于宋代蜀中文人。杨慎状元及第时，督学刘丙视为奇才，赞曰：“吾不能如欧阳公，乃得子如苏轼”^[15]。黄辉长于诗书，被誉为“从今诗苑书坛史，记下东坡第二人”。明代朱玺在《刻黄慎轩先生藏稿纪》中云：“蜀有苏子瞻、杨升庵两先生名重千秋，其著述种种，刻布宇内，几为二绝。厥后有黄慎轩先生，可称属三绝矣！”^[16]将蜀中当世文人与蜀中前贤进行类比，既是对当世文人的赞赏也是因蜀中文化传统相因相习的结果。明代巴蜀文人受蜀地先贤的影响，其文学创作亦会沾染前人的特点，杨慎与李子安、刘大谟、谢应芳、敖英、程启充同游凌云山清音、竞秀两亭，作有《凌云寺》，诗中“才着登山屐，翩翩兴欲狂。白云钟磬里，任意宿僧房”句颇具苏轼清透超逸、随性自怡的风致，故而陈田《明诗纪事》谓其“晚乃渐入老苍，有少陵、谪仙格调，亦间入东坡、涪翁一派”^[17]。

其次，明代巴蜀地区的文人才士通过文人结社传递了蜀地文人的文化自信。巴蜀之地历史悠久、古蜀文明溯源甚远，蜀地留下了众多的历史古迹和文人足迹，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多选具有历史遗迹和先贤足迹的地方出游集会，交游集会对蜀中先贤

与历史文化多有称颂。杨慎在蜀中修《四川总志》期间与凌云会成员刘大谟、谢应芳以及修志的王玉垒、杨方洲同游浣花溪，作有《泛舟浣花，东阜、狷斋同赋》，诗中“杨雄玄阁不寂寞，杜甫草堂天下稀”^[18]句直陈汉代扬雄在蜀中玄阁中潜心圣学而后声名大噪。唐代杜甫旅居浣花草堂吟咏赋诗佳篇迭出，点明巴蜀学子应当效仿学习此等文豪才杰，同时也展示了蜀中先贤事迹，表达了传承四川文化的自信。嘉靖年间的浣花溪集会成员，除了参与浣花溪集会外，也曾出游石犀寺、北城楼、牛山草堂。李元龄作有《九月五日同社中诸友登北城楼》，诗中“三川骇烛原天府，驷马题桥古帝州”句，其化用王勃“川泽纡其骇瞩”及司马相如“驷马题桥”典故，盛赞了蜀中天府之国的地理优势及历史悠久的古蜀文明。

再次，科举取士制度与巴蜀文人结社互为滋益。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的关系十分复杂，科举考试为文人士子结社提供了契机。科举制度推动了文人结社的发展，对文人结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文人结社发展到一定程度与水平的时候又会反馈于科举考试，使科举制度更受推崇与认可。^[19]蜀地对科举颇为重视，正德年间的丽泽会主要内容为“讲习交流”，其互相切磋、互为滋益，与会者皆于次年中试。周以庠主导的八愚社旨在“督课文艺”，将科举与结社相结合，通过“拔邑之颖异者八人督课文艺”，最终实现了“五人俱登进士”。明代巴蜀文人结社是文人才识的展示，也是科举官能的映现。士子通过科举考试以示其才识，朝廷进而任用才识之士为官，完成科举与文人才士的初步对接；而身具官员和才士双重身份的才俊进一步组织、参与文人结社，推动文社的发展，实现了文人才士与科举制度的深度勾联。巴蜀文人结社的主体亦是兼具了官员及才士双重身份的文人才俊，科举及第后名声渐显的文人更容易被文人才士认同接受，进而掌握发言权与话语权，引领文坛的风尚。通过科举考试为官的士子会形成一个文化圈，其既熟悉朝堂、官场上的规矩做派又知晓文坛的流派风尚，聚而结社既可品谈当代政治文化的风致亦可赏鉴自然风景之瑰丽。文学观点相合者结社交流互动进一步促进推动文学流派的发展，如竟陵派、七子复古派、公安派。政见相通者结社交流共同探讨对策及方案，如凌云会成员筹划并完成了《四川总志》的编撰，聚桂文会则“文会之作，固有补于司政者不少也”^[20]。

四、明代巴蜀文人结社的文学及文化价值

明代巴蜀文人继承了蜀学传统接续了蜀学脉络，并在此基础上以文人结社的方式完善了四川文化传统的构建。明代巴蜀文人通过文人结社增进了文人之间的交流，丰富了巴蜀文人的精神文化，推动了地方文学活动的发展、促进了文学创作的繁荣，提升了巴蜀籍文人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传播了巴蜀文化及文学观念，并对后世巴蜀文人具有引领导向作用。

其一，文人通过结社酬唱展示了文才风流，增强了影响力和声誉。正德年间嘉定州文人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张凤、彭汝实集会峨眉，既展示了文学才华也增强了声望名誉，七人留下的西坡联句、“七笑”诗为后世所传。后世文人提及峨眉之景便会述及此次峨眉集会之事，窦绚《游峨眉山记》载：“有虎跳桥……蜀人张凤等七人游此，题其桥曰七笑”；刘君泽《峨眉伽兰记》西坡寺一条载：“嘉州七贤……尝集饮寺中，有诗碑记其事”。当然，文人通过结社也扩大了交友范畴、刺激了文学创作。张凤在《夹江县平川书院记》中记其游峨眉之事：“嘉定黄门安公磐、侍御徐公文华、程公启充、济南守章公寓之、河东运使王公宣，偕予游峨眉诸名山。”^{[21]507}游峨眉山之前，张凤与嘉定州名士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先聚于夹江游览毗卢寺，并夜宿于此，翌日入山。入住毗卢寺时逢夜雨，安磐作有《游毗卢寺即景》云：“孤城带山雨，石东沧江长。凉月下莲漏，晓风吹竹房。方外有遗乐，空中多异香。长斋诘空寂，醉里失仁王。”^{[22]433}徐文华《游毗卢寺》云：“信宿毗卢寺，篝灯看佛书。溪容度壑晚，山雨入疏。万象空还有，三生事若虚，逃禅吾岂愿，冰笋梦蓬蓬。”^{[22]434}王宣《游毗卢寺》云：“胜览遍丛林，僧房惜苦吟。偶从行乐地，分得坐禅心。夜静乌声寂，雨来云气深。百年一拘隙，华发复相侵。”^{[22]432}三人所作游毗卢寺的诗歌形式虽有不同，内容及感情却相似：一是点出了夜来山雨之寒，二是述及了佛家圣地的静谧安乐，三是受寺中氛围影响生发禅心与顿悟之感。安磐还作有《入山》一诗以“昨宵风雨晓来晴”“喜共山灵有旧盟”，表达此次出游相集之乐。峨眉集会后，七人才被冠以“嘉定七贤”的称号，其游览峨眉时所作的诗歌或刻于石碑或录于《峨眉山志》，存留至今。

其二，明代巴蜀文人之间的结社促进了文人思想与宗教思想的互通，也促进了文人才士对儒家经史、易理的研究。明代文人结社与儒学、佛学有着紧密的联系，文人结社按照类型分类，可分为具有文学性的结社，如诗社、文社、经史社；具有宗教性质的结社，如文人禅社、佛会。在万历以前，明代巴蜀文人结社多与儒学相结合，文人结社的内容多为赋诗、研文、读经、

讲史、讲学、论道等，如丽泽会的集会内容为“会则取五经群籍，相讲解问难，各出所著，其修润之。德善相劝，过失互规，充然各有得焉”^[22]，结社集会皆与儒学密切相关。万历年间佛教高僧多出，其主张三教同源，践行大乘佛教精神，文士也因此逐渐亲近佛教，士僧雅集结文人禅社的情况时有发生，在万历至崇祯年间，蜀地的文人也多有结禅社，如张峨南青莲社、范文光莲社。崇祯年间，范文光与闻达大师等在峨眉山顶结文人禅社——莲社。崇祯年间由于受到战乱的影响，原有的文人社团或散或亡，文人结社现象逐渐衰落。范文光辞官归乡后卜居洪雅县花溪，因其有出世向佛之心，乃游峨眉山欲参禅念佛以终老。范文光在《续莲社序》一文中述及其登峨眉顶，感“殿宇颓废，佛事寥落”，故而与闻达大师续举社事，力求改变旧习，通过参禅悟道以达心境纯粹空明，其总结莲社的意旨在于“但使山中佛号不断”“暇身心，以益精进”^[23]。其意旨在佛学方面表现为使佛法得以继续传播、礼佛之人依然不绝，在文人思想方面则表现为使人身心放弛、学问精进。明朝末年禅佛思想与文人思想多有结合，这也与晚明时期人文主义思想的萌芽、文人思潮的多样化以及文人思想意识获得宽松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其三，明代巴蜀文人结社丰富了四川文人的精神文化，体现了乡邦意识和地方文人群体意识。明代巴蜀文人结社促进了文人群体意识的形成，进一步促进了明代四川文学的发展，文人通过整理地方文献、搜集地方文人创作编撰成集，以弘扬四川文化。凌云会参与成员杨慎在修撰《四川总志》外，还编有《全蜀艺文志》，录入了诸多体现四川文学传统、展示四川文人才识与气骨的诗文创作。杨慎在《全蜀艺文志》中重视对“仗节死义”之士的文章的选录，其选录了唐宋时期巴蜀之地士大夫“忠谏”“谏诤章疏”之文并“表以出之”^[24]，既是对巴蜀忠正直介之士的褒扬也是对巴蜀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杨慎辑录及选评歌咏了宋末元初合川钓鱼城保卫战中英烈诗文，是对巴蜀英雄的礼赞及民族气节的弘扬，选录点评“嘉定四谏”（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彭汝实）等“端士”的诗文，是对遭受“议大礼”事件被杖责、贬谪的同僚的忠直耿介品行的表彰。杨慎辑录选评的这些诗文，体现杨慎编辑《全蜀艺文志》旨在弘扬四川优秀传统文化，以达到“扬四子之芬，而成一邦之史”^[25]的意图。这样的意旨始于文人结社，而凝练于对蜀文化的传承与传播。杜应芳、胡承诏继而辑《补续全蜀艺文志》，补录了大量明代蜀籍文人的诗文作品，其补录的诗文作品多为写景抒情、酬唱赠答之作，既体现了蜀地的风物名胜又呈现了巴蜀文人的才情意气。金爵、高第将绵州芙蓉溪赋咏吟诗的一百四十余位文人的诗作辑录成《蓉溪书屋集》七卷、《蓉溪书屋续集》五卷，辑录之诗皆为文人才士在芙蓉溪酬唱歌咏之作，惜现已不存，不能探其盛况。明末新繁文人费经虞将明代四川地区二百六十四位文人的一千一百七十六首诗作辑录成《蜀明诗》十五卷，又与其子费密辑有《剑阁芳华集》二十卷，对明代四川作家作品有比较全面的收录，辑录了诸多现已文集无存的四川文人的诗作，文献存留之功尤巨。此类辑录保存巴蜀地区文人文学、重视地方文人文学创作的行为是对地域文学的重视。

其四，明代巴蜀文人结社接续了四川文学的脉络，对后世巴蜀文人才士认同、承续巴蜀文学脉络有着潜在的导向作用。巴蜀地区文人辈出，汉代赵宾、扬雄，晋朝范长生，唐代李鼎祚，宋代谯定可谓易学大家，到明代熊过、来知德精于《易》学，前后接续、文脉相承；汉代司马相如、扬雄，唐代陈子昂、李白，宋代的“三苏”所作的诗论文词赋声名远扬，到明代杨慎、赵贞吉、熊过、任瀚被誉为“西蜀文坛四大家”，代代文豪、各领风骚。这些巴蜀大才在经史、文章等方面所作的积淀，使巴蜀文人形成了“文史见长”和“崇实不虚”的特性，明代巴蜀文人在其基础上进行了承继和发展。明代巴蜀文人在结社集会中通过讲习交流、读经讲史、参禅悟道等方式强化了其特性，并将其融入于文学创作及生活之中，起到了承前启后、前后相续的作用。虽然清代巴蜀文人结社情况待考，但清代“锦江六杰”的出现已经代表着清代蜀学的繁盛^[26]，这与明代巴蜀地区的文士对四川文学脉络的接续密不可分。

参考文献：

[1]何宗美. 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M].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1:17.

[2]黄梅. “湖广填四川”移民现象的历史考察[J]. 重庆社会科学, 2017(3):81-91.

[3]王文才. 杨慎学谱[J].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123.

-
- [4]王士. 池北偶谈[J]. 济南:齐鲁书社, 2007:124.
- [5] 王文才, 万光治. 杨升庵丛书(第3册)[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3:201.
- [6] 王文才, 万光治. 杨升庵丛书(第4册)[M].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3:129.
- [7] 冯任修, 张世雍. 新修成都府志(天启)[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
- [9] 田秀栗, 施泽久. 泸州直隶州志(光绪)[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721.
- [10] 朱之洪, 向楚. 巴县志(民国)[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211.
- [11] 王麟祥, 邱晋成. 叙州府志(光绪)[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207.
- [12] 曹学. 蜀中广记[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119.
- [13] 张佳胤. 居来山房集[G]//四库全书存目补编. 济南:齐鲁书社, 2001:578.
- [14]任乃强. 华阳国志校补图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744.
- [15] 李调元. 升庵先生年谱[M]. 北京:中华书局, 1991:2.
- [16] 张觉明. 晚明公安派副帅江盈科研究[M]. 中国台北:成文出版社.
- [17]陈田. 明诗纪事[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1399.
- [18] 杨慎. 升庵遗集[C]//杨升庵丛书(第4册). 成都:天地出版社, 2003:378.
- [19]李玉栓. 明代科举与文人结社[J]. 上海大学学报, 2016(3):77-85.
- [20] 杨维桢. 东维子文集[C]//文渊阁四库全书.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3:429.
- [21] 文良修, 陈尧采. 嘉定府志(同治)[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
- [22] 张寿镛. 四明丛书[M]. 扬州:广陵书社, 2006:1623.
- [23] 文良修, 陈尧采. 嘉定府志(同治)[G]//中国地方志集成. 成都:巴蜀书社, 1992:550.
- [24]杨钊. 杨慎《全蜀艺文志》对“仗节死义”之士诗文的选评[J]. 中华文化论坛, 2016(9):114-120.
- [25]刘琳, 王小波. 全蜀艺文志[M]. 北京:线装书局, 2003:12.
- [26]刘平中, 廖春兰. 文化自觉与自强:试析“锦江六杰”对清代蜀学的恢复与重建[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2003(9):185-189.

注释：

1 唐长寿在《“嘉州七贤”与峨眉》一文中考据此次峨眉聚会乃张凤与嘉定州名士章寓之、王宣、安磐、徐文华、程启充先聚于夹江游毗卢寺，而后相携游峨眉时遇新进贡士彭汝实，七人同游峨眉。刘君泽记其为罢官归乡实为误记。

2 据《明督抚年表》记录：李子安(蟠峰)嘉靖二十年奉命离蜀；刘大谟于嘉靖十九年至二十二年巡抚川中，敖英(东谷)于嘉靖二十年至二十二年间任四川右布政使。根据凌云会与会者在蜀时间，可推测出凌云会集会时间为嘉靖二十年。